

書 評

謝 偉 傑*

David A. Graff

Medieval Chinese Warfare, 300-9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88 pages, ISBN 0-415-23955-9

從軍事史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有不少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主要是從兩方面入手：軍事制度史（history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和戰爭史（history of war）。軍事制度史的中心課題是軍事制度（軍事制度就是指國家組織、管理、發展和儲備軍事力量的制度）的結構、內容和組織的演變；戰爭史的中心課題則是戰爭型態的轉變，也包括了對重要戰爭與武器裝備的探討。在漢至唐的歷史時段中，軍事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如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¹ 高敏《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² 谷霄光《府兵制度考釋》、³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⁴等，主要探討軍制的內容與演變。⁵ 這一研究取向，綜括一時段的軍事制度，包括多個項目，在討論士兵來源問題時，更涉及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軍制史雖作為中國軍事史研究的主流，卻始終未能擺脫被視為制度史研究的一端。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碩士，現任文達（香港）出版公司助理編輯。

1 黃今言，《秦漢軍制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2 高敏，《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3 谷霄光，《府兵制度考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4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5 日本學者如濱口重國、菊池英夫、谷川道雄等有關漢至唐的兵制研究，也屬於軍制史的範疇。

戰爭史方面，如朱大昀《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⁶朱大渭《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⁷李斌城《中國農民戰爭史·隋唐五代十國卷》⁸等，主要著眼於對歷代戰爭的考證、分析，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史學發展影響之下，偏重於農民戰爭的探討。此外，海峽兩岸先後出版了大規模的《中國歷代戰爭史》（18冊）⁹和《中國軍事通史》（17卷20冊），¹⁰內容包括了政治與社會狀況、國防措施、戰略與戰術的運用、主要人物、重要戰役等，可謂涵蓋廣泛。然而，記述戰爭的篇幅仍然佔大比例，因此，這些書仍屬於戰爭史的範疇。戰爭史的研究，著重一場戰役的起因、過程和影響的探討與考證，雖然對一場戰爭提供清楚的認識，有時卻不免侷限於一點之中，未能貫通其他方面。¹¹

在西方學界，軍事史研究蔚為大國，但以之應用於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卻寥寥無幾，而能夠勒成專著的，到如今最有代表性的只有 John K. Fairbank 和 Frank A. Kierman, Jr. 合編的 *Chinese Ways in Warfare*，¹²是對帝制時代中國軍事史研究的縱覽之作，惟仍然有欠深入。

軍事組織其實是社會組織之一，軍事組織、結構的發展與政治、社會的情況是不可分離的，軍隊與社會並非兩個分離的團體。軍隊能夠運用武力手段改變政治、社會現狀；社會變遷與政治決定也會改變軍事制度。國家、社會與軍事制度三者是貫通的，是相互發生作用的，研究軍事史而不顧及國家與社會方面是不全面的。因此，一部能夠貫通三者，提供宏觀視野的中國軍事史研究的著作亟待出現，本書正為填補這一空缺作出努力。

全書共 11 章，另有引論和結論。作者在引論中解釋為何選取公元 300 至

6 朱大昀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7 朱大渭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魏晉南北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李斌城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隋唐五代十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三軍大學中國歷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歷代戰爭史》（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

10 軍事科學院主編，《中國軍事通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11 軍事地理也是中國軍事史研究的一支，內容偏向戰爭史研究，例如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1991）；饒勝文，《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12 John K. Fairbank and Frank A. Kierman, Jr. (ed.),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00 年作為討論的「中古」範圍。作者認為中國中古史始於西晉滅亡，代表了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崩潰，中國從此陷入了長期的戰亂與分裂之中；以唐末作為中古史的完結，則是受內藤湖南的中古與近世分期學說影響。這六百年間充滿了戰亂與分裂，戰爭的脈絡貫穿了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發展。作者又指出研治中國軍事史所遭遇的難題，主要是史料的問題。作者在此特別著眼於儒家文化所發揮的影響，認為在儒家經典的薰陶下，負責修史的文官，往往受重文輕武的觀念影響，對材料進行一番選擇取捨的功夫，使對戰爭的論述多偏重官員們對戰事的討論，以致很多戰爭中的真象反而顯得模糊不清；一些文官喜以儒家經典解釋用兵之略，又使實際的行陣經驗受到輕視，記載也因而較少。

作者以公元 300 至 900 年為討論的時段，不過，歷史的演變是不能割裂的，一個時段必然對前一個時期有所承傳與革新。因此，作者在第一章追溯中古以前的歷史發展對中古時期的影響。本章闡述了軍事制度與戰爭形態在戰國時代經過了劇烈的變動：將領出身自平民、全民皆兵、大規模的步兵、騎兵的運用、新式武器的出現、新的圍城技術等，取代了春秋時期的模式，成為秦漢以後軍制與戰爭模式的濫觴。而秦漢時代為了應付北方遊牧民族，日益重視騎兵與蕃兵的運用，對中古軍制、戰術、兵種皆帶來了深刻影響。作者進一步將戰爭與中國文化關聯起來，指出在中國文化中，重視於戰爭中以智慧取勝，有一種重智不重力的傾向。進入戰國，戰爭中更強調軍隊的紀律，認為比英雄主義更重要。另一方面，戰爭日趨複雜，軍事智識日形重要，需要透過學習掌握，由此衍生了文人較武夫優勝的思想，文官漸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領導軍隊，卻不需親身接戰，只需決勝千里之外。中國文化中對「儒將」的推崇，尤其體現了重文輕武的觀點。探討中國歷史中將領形象的變化，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將領形象是深受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的影響，惜乎或限於篇幅，作者未予深論。

從第二章至第六章，探討了兩晉南北朝之間的歷史發展。在第二章中，作者從漢、晉軍制的演變與政治、社會的發展探討西晉的覆亡。漢末動亂促成了世兵制的出現，胡族騎兵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以及軍隊的指揮權落入地方軍閥手中，到魏晉之時，已積重難返。匈奴、羌族入居後不斷繁衍，構成了中國北方的種族與人口壓力。他們未能同化於漢族，更漸成亂源。而地方

軍力的強大，雖有晉初裁撤州郡兵的嘗試，卻未能成功，出鎮諸王仍然手握重兵。胡族與宗王出鎮的問題交互作用，終於釀成了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

第三章論述了永嘉亂後北方的發展，作者把注意力集中於塢堡的情況與十六國之間的分合。北方大亂，未能或不願南渡的晉民在地方大族的凝聚之下結成塢堡，一方面進行耕織生產，一方面組織武力自保。塢堡成為了當時北方普遍的現象，擔當了地方基層組織的角色，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各胡族政權則採取將生產人口（漢人）與作戰人口（胡人）分而治之的統治模式。在胡漢分治的格局下，胡族政權因人數較少，本族人多集中在國都與一些邊鎮之中，是一種點式的控制。也就是說，胡族政權能對首都一帶施行直接統治，對外圍地區則只能施行間接統治，需要借助地方勢力如塢堡進行統治。因此，作者認為這一模式顯示了胡族政權一個致命弱點：軍事力量與政權結成一體，一次軍事失誤或失敗，足以引致政權的崩潰。石勒於洛陽擊敗劉曜，隨而席捲前趙政權，就是一例。此外，各族未能融合，以及胡族國家因君位繼承而內鬩，均構成了十六國政權速亡之因。拓跋氏能夠統一北方，建立比較長期而穩定的政權，除了是因為得到前燕作嫁衣裳之外，也是北魏能夠有效吸納各族人民的結果。

作者在第四章論述了東晉南朝的政治演變，以門閥政治、僑姓、吳姓之爭與荆、揚之爭解釋了東晉南朝的不穩定因素。考慮到當時兵源與兵制的問題，作者對僑州郡的設置、世兵制和募兵制的演變均作出了探討。作者還回應了在第一章之中所言的重文輕武文化的影響，認為崇文風氣一直在南朝發揮影響，即使南人以武功晉身，亦往往向文職轉化，以致不能出現如北方的「武士階級」。

相反，北朝出現了文武合一，力量強大的「關隴集團」，因而得以統一南北。作者在第五章中，先探討六鎮之亂的問題，再分析高氏與宇文氏政權的發展，特別是宇文氏府兵制的建立，更是焦點所在，作者以詳盡的篇幅描述西魏、北周府兵制的內容，並指出此一制度代表了西魏、北周民族融合的成功，產生了新的統治集團，為中國的統一注入了新動力。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對其政權的鞏固以至統一北方自有其作用，更為隋、唐承襲，從來便是中古軍制史研究的重點，作者對之加以重視是合理不過的。然而，作者過於強調府兵制，卻未有討論東魏、北齊的軍制。作者對關隴地區有足夠的重視

了，但高氏政權在河北立國，對當地有何影響？東魏、北齊的軍事制度對隋、唐有何影響？作者皆未有析論，實為美中不足的地方。

第六章集中討論南北戰鬥力的差異，以及雙方在戰爭中所要面對的問題，如南方軍隊進攻北朝需要面對補給問題，北方軍隊南下面對水道縱橫的情況，騎兵的威力無所施用。作者從雙方在江河交戰的論述，進而批評中古中國對海戰與海洋的忽略，並未於戰爭之中利用海洋的條件。作者的批評，其實是一個程度的問題。限於地理環境，古代中國當然不可能像希臘、羅馬、拜占庭般多次進行海戰，不過，中國並未完全忽略海洋的作用。例如三國時代，吳國多次利用海道與遼東公孫氏往還，以圖掣肘曹魏，更與魏軍爆發了山東海岸的成山之戰；北魏獻文帝之時，與劉宋爭奪青齊地區，南朝更以海路派遣援軍，皆是戰爭中利用海洋之例。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論述隋、唐的歷史發展。第七章首先分析隋與突厥的關係，並指出隋在與突厥戰爭中所面對的難題，包括遠征的補給問題，以及隋軍的重裝甲騎兵在速度方面不及突厥的輕騎兵，由此而推動了隋、唐由甲騎具裝向輕騎兵的轉變。對於煬帝三征高麗（高句麗），更是本章重點處理的課題，對隋軍投入的人數、戰爭的過程、失敗原因和影響，均有詳細論述。不過，作者認為隋代君主希望恢復漢代的光輝，遂有此向外擴張之舉，卻不免淡化了高麗在東北對隋的威脅。隋與高麗的關係涉及當時的東亞形勢，作者雖然已留意到高麗與東突厥、靺鞨的關係，卻未有深入討論，而對於高麗意圖扶植北齊流亡政權的影響，也未有交代，似乎對隋與高麗的關係未有透徹闡釋。

唐室在群雄割據中脫穎而出，作者認為唐的成功在於能夠運用靈活的外交手腕，吸引各方支持者。在第八章中，作者特別強調李世民的貢獻，對他在擊敗王世充、竇建德的戰役的過程及所運用的戰術，進行了細緻描述。在第九章中，作者指出唐政權的成功建立與穩定，端在於與地方勢力的關係之上。唐初為了穩定局勢，與地方勢力妥協，容許地方武力存在。唐太宗即位後，便著手削弱地方豪強的力量，從而鞏固了唐帝國的基礎。府兵制在吸納地方武力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過，府兵制漸漸不能適應版圖日大的唐帝國，募兵制度因而興起。對外戰爭的需要，終於令唐的國防體制，以至整體軍制發生變化。

由府兵組成的行軍，只利於速戰速決，不利於長期的戰爭和屯戍。然而，自七世紀開始，唐所面對的敵人已非一場戰役可以解決的，舊的行軍體制已不合時宜，軍隊長期戍邊的需要日增。因此，軍制的轉化已不可逆轉，節度使、藩鎮與職業兵遂應運而生。舊問題雖得到解決，新問題卻隨之出現。節度使權重、安祿山受重用、節鎮軍士對中央的向心力下降，終於爆發安史之亂，把唐朝推向藩鎮割據的深淵。這就是第十章所要討論的問題。第十一章緊接著探討安史之亂的影響，唐所面對的內憂外患，並著重論述唐末藩鎮割據的情況，藩鎮組織對五代和宋的影響。作者強調「驕兵」是此時期最嚴重的問題，軍隊效忠與否，只取決於報酬，成為時代極不穩定的因素。宋代統治者成功作出改革，改變了這一局面。不過，在認同作者這一見解的時候，不可忽視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絕對的問題，因為宋代實行募兵制，仍然免不了「驕兵」和耗費養兵的問題。作者還指出唐宋之間，鑑於驕兵的問題，重文輕武的思想得到鼓勵，日益高漲。而「唐宋變革」的概念，體現在戰爭形式之中，亦並非絕對的，宋代的戰爭中，雖已應用了火藥，但戰爭模式沒有太大轉變。而宋代許多的軍政制度，其實是繼承唐代而加以損益，即使是廣為人知的以文官統軍，也不是宋代的新發明，在宋以前就已存在，宋代的發展實未與傳統斷絕。

最後，作者在結論中重申以軍事史的角度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並作出了一些中國與拜占庭軍事史的比較。作者還特別強調中國沒有產生軍事貴族，是因為在傳統價值觀影響之下，將領向文化修養方面轉化，中古時期顯赫一時的「關隴集團」遂因此消逝。

本書作為西方學界第一本探討中國中古軍事史的專著，在填補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缺，作出了重要的示範作用。本書旨在探討晉至唐之間，戰爭、社會與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影響，並不囿於軍事制度、戰爭形態的討論，而能夠將兩者與當時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情況串連起來，既縱觀各時代的演變，亦橫向地觀察當時各範疇的相互影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宏觀、多面向的架構，為中國中古軍事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作者不囿於中國史的研究之中，多次以中國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歷史比較。在討論晉代世兵制時，作者指出其與羅馬帝國戴克里先（Diocletian）引入的世襲兵制相似。在論及中國的海戰問題時，作者舉拜占庭和阿拉伯的例

子，以證明中古中國海軍的運用程度遠低於同時的西方國家。隋代推行總管制，掌握地方的軍政，作者認為這一政策與拜占庭的“Themes”相似，對兩者的相似之處作出了介紹。當然，隋的總管制與拜占庭的“Themes”是相似的，但唐代的節度使似乎與之相類程度更大，惜乎作者在討論唐代節度使的時候，未再論及。作者又以李靖兵法與拜占庭的軍事經典（*Strategikon*、*Tactica*）作出比較，認為它們在戰略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處，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比較研究的課題。其實，作者最關心的比較是存在於中國與拜占庭之間，在結論之中，作者用了頗長的篇幅指出中古中國與拜占庭所處身的文化背景和歷史環境的相似性，證明了兩者的可比性，並在戰爭技術、對戰爭的態度、文武關係、戰略思想等方面作了概括的比較。

本書所作的比較，顯示了中國軍事史的研究並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可以置於世界史的眼光之中，透過比較對中國的特色有更清楚的了解。特別是拜占庭的軍事史料豐富，與中國又每多相似之處，確是比較研究的好課題。¹³限於本書的體裁，作者在書中所作的比較雖然簡略，卻已為中古軍事史的跨文化比較研究作出了很好的示範作用。

此外，作者多次強調中國文化中的一些傳統價值觀及春秋戰國所形成的經典思想對此後戰爭規範、戰略思想的影響。強調文化、歷史等規範對戰爭的影響，正可聯繫到戰略文化的研究，也是中國中古軍事史研究的又一課題。

本書對中國中古軍事史研究的拓荒性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不過，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第一，全書旨在以軍事角度為中心，統貫軍事、社會、政治三方面分析中國中古史的演變。這一嘗試並不容易掌握，因為涵蓋面太廣。本書給筆者的印象是有點鬆散，三者的論述時輕時重，令人有難以一條主線貫穿全書的感覺。在內容方面，作者可能要顧及一些西方讀者對中國史的認識水平，因而往往出現敘述多於分析的情況。而且，作者對於擅長的課題（如唐初戰爭）加以詳細剖析，其他的一些問題卻只是稍一揭示而未有深入討論。¹⁴

13 近年已有學者進行中國與拜占庭戰略文化的比較研究，如曾瑞龍，〈北宋及拜占庭帝國的彈性防禦戰略初探——兼論宋夏洪德城戰役（1092）〉，載張其凡、陸勇強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223-250。

14 作者的博士論文是“Early T'ang Generalship and the Textual Tradition,” Ph.D. dissert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並有多篇唐初軍事史的文章。

第二，作者引用的英、日文資料甚豐，但在中國資料方面，作者所參考的材料似嫌不足。例如討論東晉門閥政治與北府兵的始末，未見引用田餘慶的作品。¹⁵ 在有關隋朝的論述中，作者主要基於 Arthur Wright, *The Sui Dynasty* 一書，此書誠然是西方學界隋史研究的經典之作，但畢竟出版已超過二十年，對隋與高麗的戰爭、隋代兵制的問題，劉健明、黃永年等已作出新的研究成果。黃氏對於府兵制尤多創新之見，惜皆未見作者引用。¹⁶ 此外，王永興、孫繼民對唐代軍事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可以參考的。¹⁷

第三，是一處資料上的錯誤，作者在第二章中指長沙王司馬乂是晉武帝的第六子（頁 45），而在註釋中卻也稱成都王司馬穎是晉武帝的第六子（頁 52，註 38）。其實，晉武帝第六子是司馬乂，而司馬穎是武帝的第十六子。

最後，本書既以中國史為題材，書中的索引如能再加上一個中英人名、地名的對照（Glossary），將會更方便讀者尋覽。

要之，瑕不掩瑜，本書作為中國中古軍事史的第一本英文專著，其拓荒性的貢獻值得肯定。作者揭示的跨文化比較、文化對戰爭的影響，以及軍事、政治、社會互動關係等研究課題，均為中國中古軍事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啟示與指南的作用。

15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田餘慶，〈北府兵始末〉，載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05-349。

16 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黃永年，《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內收錄了相關文章。

17 王永興，《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